

## 《中国近代史》第十五章第七节

作者: 张海鹏 发布时间: 2004-6-22 13:03:26

### 第七节 国内政治的新变化 民主党派的出现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反共气焰有所收敛,但反共活动并未停止。据周恩来1942年4月报告,自年初以来,国民党制造的反共事件即达109起。中共一方面估计到国民党可能利用国际形势和战局发展的某些因素,发动新的反共活动;另一方面,也预见到国际环境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必然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起一定的制约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认为虽然根本解决国共关系的基本条件还不成熟,但两党关系可能出现某些转机,通过谈判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提出,按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争论问题,及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问题。

1942年9月,蒋介石对周恩来表示,拟请毛泽东于同年10月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毛泽东亦表示准备前去与蒋介石谈判,将国共关系根本加以改善。10月,中共中央首先派林彪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提出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加强合作的具体条件:(1)承认中共合法化。(2)要求将包括新四军在内的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编为4军12师。(3)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实行中央法令,但人员与地境不变。(4)作战区域根据目前情况作适当调整。1942年1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详细讨论中共问题。蒋介石表示,希望国共问题整个地迅速解决,不要零零碎碎拖拖拉拉。但由于国民党方面缺少诚意,缺乏应有的实际行动,使谈判无法取得进展。1943年7月,周恩来、林彪返回延安。

在此期间,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又一次全国性的反共活动,中国再次面临分裂和内战的危机。6月12日,蒋介石指使特务在西安召集所谓“文化团体”开会,发表通电,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中外报刊发布了这个消息,趁机扩大反共宣传。在军事上,5月下旬蒋介石即密电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6月,胡宗南按照蒋的命令,进行反共军事部署。该战区二个集团军又二个军,四、五十万军队准备兵分九路“闪击延安”。国民党准备进攻延安的图谋,通过中共的情报渠道传到延安。国共团结抗战大局面临破裂的严重危险。为制止分裂内战危机,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胡宗南等,呼吁团结,避免内战。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边区部队作好应战准备,八路军主力一部调至陕北和晋西北待命。

7月9日,延安召开三万人参加的纪念抗战六周年民众大会,发表通电,反对内战,保卫边区,向反共顽固派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中共南方局及中共在大后方的代表机构,积极奔走,调动一切力量,发动停止内战运动。国民党的反共行径不仅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英、美、苏也对中国国内的这种严重局势表示不满。7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少外国记者纷纷质询内战危机。上述各国大使会晤,警告重庆政府,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将停止各国的援助。

在强大的国内国际舆论的反对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偃旗息鼓,停止军事准备活动。7月11日,蒋、胡复电朱德,说明无进攻边区之意。7月12日,胡宗南下令撤退部队,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了。

就在国共两党既联合又斗争的态势下,被称作第三种力量的民主党派悄然出现了。这些党派的首次集结,出现在抗战初期的国防参政会时期。国防参政会是1937年8月中旬,国民党在共赴国难大趋势下成立的一个隶属国防最高会议的战时政策咨询机构,它虽然人数与职权均极其有限,却吸纳了战前一直被排斥于国家政治之外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主要在野党派和社会团体领导人。

1938年7月成立的国民参政会是社会各阶层宣传主张与开展政治活动的合法阵地,也是中间党派合作联合的枢纽。在国民参政会初期,这些党派最成功的合作,就是在1939年9月一届四次参政会上联手促成第一次宪政运动。青年党左舜生、国社党张君勱、第三党章伯钧三人共同领衔的《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和张君勱单独提出的《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首次明确要求结束一党训政、实施宪政。在提案审查会上,曾琦、左舜生、李璜、罗隆基、徐傅霖、章伯钧、邹韬奋、陶行知等彼此声援,达成了《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根据这一决议,蒋介石指定黄炎培、张君勱、周览等25人组成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

由于国民党对客观、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本来没有诚意,绝不会轻易把手中的“治权”变成难以控制的“民权”。1940年2月12日国民党中央下达《对实施宪政问题之指示》,强调宪政讨论必须由各省市党部、政府会同所在地参政会召集,并对讨论宪政进行了种种限制。第一次宪政运动发动不久,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皖南事变的发生,以及沈钧儒等被排除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等,使中间党派感到沉重的压力,维护与加强自身地位的愿望使它们感到有必要进一步的联合。1941年3月19日,由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职教社、乡建派领袖及个别无党派人士组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盟”以互选的形式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黄炎培、左舜生、梁漱溟、张君勱、章伯钧5人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制定了“政纲”、

“简章”和《敬告政府与国人》宣言。

以实现民主政治为帜志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成立到公开经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为了造成既成事实，使国民党不得不承认，梁漱溟受委托到香港创建言论机关。9月18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10月10日在免检的广告栏中以“启事”的形式发表了宣言和政纲。1941年11月16日，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张澜、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在重庆茶会，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从此，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党开始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国的政治格局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于《对时局的主张纲领》（“即十大纲领”）。它的突出特点是明确提出“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这两项主张概括了政团同盟及后来中国民主同盟的基本立场。张澜阐述说，前者的目的是实行主权在民的民治，以期建设一个政治自由、经济平等的新民主国家；后者是说军人应尽忠于国，彻底取消军队内任何党的组织，全国任何方面再不许有党军与私人武力。11月25日，以政团同盟参政员为主向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提交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提出“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蒋介石异常恼火，不准提交大会讨论。后来，几经周折才形成由蒋介石、张君勱、左舜生等五人以主席团名义提出的《促进民治与加强抗战力量案》。依照商谈协议，国民党答应建立党派间合作关系，同盟将此理解为成立战时内阁，以为这是通向政治民主的第一步，作为交换条件同意抗战期间不再提及宪政实施。然而，国民党最终自食其言。

皖南事变后，国共间进行着一系列谈判，但这些谈判都仅限于双方，未让外界插手。这是因为国民党始终没有把同盟视作一个实体性的政党，仅仅摆在利用的位置；中共则出于同盟中央实际由与国民党关系暧昧的青年党把持，所以不能不抱有怀疑态度。同盟对于国共的这种做法十分不满，多次要求谈判公开。这种状况一直到1944年才有所改变，其原因一是同盟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态度越来越激烈，影响亦越来越大；二是同盟地方支部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无派别个人盟员，以至少量中共党员，其中不少人成为地方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同盟向左转的倾向遭到国民党的不断压制，这反解除了中共的顾虑。于是中共在提出联合政府建议前不仅特意征求同盟的意见，而且将其列为党派会议的一方，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把它当作了重要的同盟军。

[下一节](#) [上一节](#) [返回目录](#)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您是第位访客